

沧州书院最早考辨

王立成



沧曲书院

河北沧州地处渤海之滨，自古英才辈出，人文蔚起，历史底蕴深厚，向来有读书重学的传统。秦至汉初，以儒学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众多典籍华章在岁月中散佚流离，多有破坏。为使文脉薪火相继，实现文化复兴，“修礼乐，被服儒术”的河间献王刘德礼贤下士，招纳英才，建立日华宫、君子馆等，积极进行文化典籍的整理传承，同时强化讲学流播，教化民众读书向学，知书明礼，使当时的河间王国成为礼教兴盛之地和儒学文化再造中心。肇基于汉，尽管时光飞逝，沧州先贤却一直秉承献王修学好古之风，始终不弃诗书，南宋末年理学家、文学家张铉翁在《题李氏敬聚堂》中写道：“千载河间旧典刑，诗书习气至今存。”

金元明清以来，处于畿辅辐辏要地的沧州文风愈发兴盛昌隆。伴随着商业贸易的日趋繁华，尤其是长芦盐业的长盛不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富庶物质力量的作用下，“重教兴学”“诗书传家”之风云起，举业方兴未艾，持续绵长，有力地促进了本土文教事业的发展。当地府州县学包括书院在内迅猛发展，仅沧州所在的长芦而言，便有明万历二十七年创建的天门书院，清雍正时创办的沧曲书舍、嘉庆年间创建的渤海书院等。在新的教化格局开拓下，凭借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构成城乡的主要群体——宗族大户不约而同激励家族子弟读书问道、研经稽古、著述立言，成为家族文化守望的精神坐标，进而谱写书香门第延续的新篇章。任丘边氏，南皮张氏，献县纪氏，沧州戴氏、王氏等家族莫不如是，他们“才称燕赵，化首邦畿，被德钟灵，造贤育士，藹藹王臣，蹇蹇帝师，高义宏材，比肩接济”，王朝、纪晓岚、张之万、张之洞等皆是其中翘楚。

就沧州区域书院教育开展的历史情形来看，当今文史界均认为较早者为元代河间路总管王思诚奏请兴建的毛公书院，如沧州市专历史系教授张玉、副教授王清纯在2008年12月第24卷第4期《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发表的论文《毛裘与毛公书院》云：“河间毛公书院是笔者所见史料记载的沧州境内最早的书院。”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洪成和研究生王蓉在2016年第26卷第1期《邯郸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古代河北沧州书院初探》亦写道：“直到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河间路总管王思诚在河间县设毛公书院，沧州才出现了有史书记载的第一所书院，这比河北省最早的书院滞后了600年左右。”得益于诸多学人对毛公书院史料的广泛引用以及媒体的大力宣传，“毛公书院为沧州城内最早书院”的观点渐成金科玉律，无人置疑；即使个别学者设问毛公书院创修者王思诚主政河间的时间范畴(纠结于泰定年间还是至正年间)，却也丝毫未影响到今人对毛公书院的开门定论。

其实，把河间毛公书院列为沧州最早书院是有问题的。严肃说来，河间毛公书院应为沧州城内已知最早的官办书院。目前已知书院最早者应为沧州长芦中和书院，有元人王旭《中和书院记》为证。

王旭，字景初，元朝东平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收其著作《兰轩集》十六卷时有过生平状述：“其事迹不见于元史，谈艺亦罕见称述”。王旭家贫，多以“教授四方”为生计。大德元年秋，王旭接受沧州高伯川的聘请，自泰山来长芦中和书院授学。王旭客居沧州长芦逾五年之久，其《寄王肯堂参议》诗云：“岱岳到鲸川，忽忽又五年。”沧州长芦地，金元时有鲸川之名。王旭在《兰轩集》之《本斋记》载：“余时未识其人，又未知鲸川为何地，风闻而作有所未可，遂辞而已。”之后五年，余至长芦，始知地名鲸川。”乾隆八年《沧州志·古迹》“鲸川八景”条亦载：“按今州治又名鲸川，金人筑金堤，俾卫水安，流通潞河入惠通，委折千里，犹神鲸鼓浪一吸百川，故名。”“游乐长芦期间，广交良朋，并不吝笔墨，或诗、或文记述了元时沧州的一些人物史志、地理风情，而所记又多不见录于明清沧州地方文献，传至今时，弥足珍贵，如诗《登鲸川楼》《东城春早》《戊戌残照》《寿高伯川》《登鲸川楼》《赠李谦甫行》等，文《李神童传》《任义士传》《赵节妇传》《鲸川刘氏昆季更名字说》《遣使祭御河文》《沧盐司祭海神文》《孝思堂记》《省斋记》《拙斋记》《中和堂记》《徐庆堂记》《中和书院记》《遐观亭记》等。

“东城春早”本鲸川八景之一，寄居河间誓死不作贰臣的忠烈志士张铉翁便有鲸川八景之诗，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引述《沧州志》云：“家铉翁，眉州人，累官至金书枢密院事。宋末时使元，教授河间，成宗即位赐还，锡号处士，有咏鲸川八景。”而王旭《东城春早》一诗则道明了东城春早之胜景所在：“鲸川东郭尽园林，春到先看柳弄金。”又在《遐观亭记》中以士绅李长卿东郭之园亭为“鲸川东郭尽园林”作了注脚，云：“大德元年春，西阜先生自历来游鲸川，爰李君长卿东郭之园亭，为大书‘遐观’二字以表之。由是斯亭遂为衣冠游集之胜所。”

王旭诸篇和沧州有关的文字中，尤让人称道的是《中和书院记》篇章，文章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高伯川创立中和书院的初衷、建构布局、师资运营等状况：“长芦高伯川，既以修财助修文庙两度而成之，又感燕山窦禹钧之事，叹而言曰：‘兴书院、养寒士，此盛德事也。北方三百余年已来继窦氏之踵者，何其寥寥耶！余陋，虽规模不及彼，而窃有希贤之志焉。’于是买地，于所居东北积水之上，虽近闾闾而幽寂旷，可为士子肄业讲习之所。乃营为二区，其东正堂三间，东序如之，以为讲师之居；其西书楼上下各三间，高明宏深，夏无暑气；东西虎亦各三间，绕以周垣，高大其门，西阜赵公为大书：‘中和书院’以表之。君又以厚



沧曲书院外景



书院内景



元代王旭《兰轩集》

币聘师儒于四方，俾专讲席，而游学之士皆代其束脩之费而廩给之。其规划措置犹未已也……且书院一事盛于南国，而北方未之有。今高君营此，盖将以北方倡而因以上迎乎天运！”元代长芦富户高伯川以克己利人、教子有方的窈燕山为楷模，舍财购地，建楼兴学，躬行教化。落成的中和书院占地壮阔，布局考究，屋室二十来间，非常轩敞，既有讲堂授教之舍，又有讲师居住之所，高墙大院间还杂以山池亭榭，茂林修竹。打造清幽环境的同时，着力提升师资水平，高薪广聘儒儒俊彦任教，并对成绩优秀者供给廩钱，力求做到名师出高徒。总的来看，经过高伯川和广大师生的通力打造，中和书院日益完善，逐步成为学子们诚心正意读书的理想之所。王旭为元大德元年秋日受高伯川之约来长芦中和书院任教，可见中和书院最迟建成于大德元年，远早于毛公书院的建造。由《中和书院记》可知，最早者当属中和书院，高伯川开沧州地域元代书院教育的嚆矢，而绝非当今文史研究者追述的至正年间王思诚创办的河间毛公书院。

毋庸置疑，长芦中和书院的创办以及顺利进行是与高伯川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沧州长芦因盐业而兴，民国《沧县志》载：“沧县(注：民国初沧州降州为县)商务当长芦运使驻节之时，磋商靡靡于此，膏粱文绣，纷华奢丽，商业繁荣非他处所及。”许多富户大贾聚集于此，他们仗义疏财，造福乡梓。王旭在《沧盐司重修公解疏导》一文中专门描述了当时的沧州人乐善好施、慷慨好义的壮举，“况今日之长芦多轻财之义士，理桥、兴书院，香名已播于四方；焚债券、建神祠，令誉复喧于众口。”高伯川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笃志重文兴教，方有中和书院这一沧州域内书院滥觞的壮举。

乾坤流转，沧桑变化。如今，长芦中和书院早因年代久远而无觅踪迹，甚至被世人忘却，但中和书院本身蕴藉的重文兴教、温良博爱、急公好义等精神内涵却世代相继，生生不息，并将沧州道德高地中的“君子”文化特质表达得淋漓尽致。纵览古今，循声良迹，显而易见，不质实。清代，沧州民办书院的杰出代表沧州书舍便是本地士绅名流李之华和张延绪热心公益、捐资兴学的仁义之举，张延绪甚至将位于沧州南关运河岸边的私家别墅无偿捐赠而出作为书斋场地。当代，“最美奋斗者”沧州人白方礼用超过极限的生命，付出了他所能做到的全部，也奉献了他对国家最朴素最深情的爱，成为家喻户晓的“感动中国人物”。可以说，崇德向善的沧州“好人之城”若上溯历史，可谓根基深厚，向有传统，由是略见一斑。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联系人: 张总 13572270596

座机: 029-88346362

官网: 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

惊世骇俗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在海内外引起轰动，青铜大立人、神树、面具，千姿百态的青铜禽兽、器皿等珍稀文物的出现，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与震撼。高鼻大眼阔嘴，脸型与华人迥异，五官外凸内凹强烈的青铜面具和金面罩(亦称“金面具”)，则是其中重要对象之一。

三星堆的青铜面具皆为入面形面具，除了轻重大小的悬殊，主要以三种眼型区别：柱形纵目、梭形眼、弧角斜方眼。柱形纵目面具较少，多大型器，个别微型器(K8⑨：774，高4厘米)。戈形大耳，眉额间或有方孔，凸饰一功能诡异的夔龙纹装饰(有的已经缺失)。梭形眼面具，皆大型器。招风耳，个别眉额间有孔，竖向嵌饰都已缺失。弧角方眼面具(有称青铜面具的明显有误差，下同)，皆平板状，唯其与人脸大小接近。以上三种青铜面具，有人认为是用于跳傩驱鬼或吁请神灵降临祈福等巫术祭祀活动，有人认为是权力和统治者身份的象征，也有人据古蜀蚕丛氏有纵目的特征，认定纵目面具是蜀王蚕丛或其域外、天外来客……至于它们的使用方法，有的认为是作为祭祀对象悬挂使用，有的当图腾柱竖置野外，有的是安置在泥或木制的偶像上供人瞻仰祭拜的。而梭形眼的“金面罩”，从权威的图文表述中，它们也是作为戴在脸上有巫术功能的面具。音乐剧《三星堆》和音乐秀《又见三星堆》中的角色，以及不少科普漫画图册的人物，作为面具直接戴在脸上，据说也得到专家的认可。

莫衷一是的推测与结论，要想一言概之厘清辨明青铜面具与“金面罩”的功能及用法不太容易，更何况“面具”一词并非仅是戴在人脸上的常识性认知。作为一种溯源古老的文化现象，面具除了形似人脸之外，其包含的名称、体量、质地、功能、使用方法等差异也很大，甚或南辕北辙；它们曾经普遍地进入先民的社会生活领域，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式。而所蕴涵的文化积淀，涉及宗教、祭祀、民俗、艺术等领域。从文献检索中发现，面具的不同称谓大致有假面、假头、面饰、覆面、幪目、死面、大面、代面、面像、脸谱、变脸、魃头、魃头、方相、魃头、脸壳、脸子、鬼脸等。其中，假面的称谓比较繁多，代面、魃头、魃头、魃头、方相、脸壳、魃头、骀头、棋头、棋头、魃头、鬼脸、变脸皆可作为“假面”的“同类项”予以合并。其中，脸子、鬼脸衍生出表情包“甩脸子”“装鬼脸”等。变脸，明显是假面的演绎，主要出现在川剧等舞台上。据此，我们便可从假面、假头、面饰、覆面等面具的功能及用法的梳理中，将三星堆青铜面具和“金面罩”厘清归类。

假面 一般用纸、木、布或丝绸等轻质材料彩绘、编结、剪凿、浇塑、泥模裱糊等技法制作。主要特征是大如人脸，有平板状，也有随脸形略作外凸内凹的形式；嘴巴和眼睛留有孔眼，便于说唱和观察，直接戴在脸上，按不同的表情与形象，分别在驱鬼、出征、喜庆等巫舞礼仪中使用。

假头 木雕或用竹、木、纸、麻布等纤维捣浆浇塑、泥模裱糊等技法成形如今的大头娃娃。留出眼睛和嘴巴的孔位，以便观察说唱表演。按不同的表情与形象，分别在驱鬼、出征、喜庆等巫舞礼仪中使用。

面饰 大多为玉石牙骨的平面浮雕或圆雕的精致小器。形象多以传说中的大巫或英雄人物为主，系佩在胸前、臂上或腰间，应该有神秘的巫术功能。新石器时代肖家屋脊等文化盛行的戴着面具的玉雕偶具有代表性。

覆面 覆面又称幪目、死面。用金、银、铜、玉等材质制作，罕见陶土烧成，也有用玉雕凿成的眼、鼻、嘴、耳、饰片等，并贴成人脸形形缝合在麻绸布上使用。它们都是覆盖在逝者脸上的面具，大小与人面相仿或略大于人面的起伏凹凸式或平板式。一般认为覆面能使逝者灵魂易于辨认其肉体，免得迷失方向无所依托，也有保护逝者面部，使其在走向黄泉的旅途中避开伤害。

面像 用木、泥、皮革、纸浆等材料制作。形象都以英雄、祖先或大巫、神灵及猛兽为主，造型较大、用途广、数量大，大型超大型面具都出自面像。不少(主要是大型面像)是悬挂、置放于神庙、社坛、门户等场所的殿墙梁上，或安置在泥或木制的偶像

晏公祠，原名道统庙，是一处特殊的人文景观，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香山之南，万安山法海寺之北，为明清时期建筑遗存。这是北京唯一留存的道官所建儒家殿堂，也算是西山寺庙的一朵奇葩。

以石像石刻独立西山

明朝正德时期，北京西山的寺院很多。宦官晏宏却别出心裁，建起一座简陋的道统庙，几间石屋刻满文字。两个写着道统门、正学门的简易山门，门里一个刻有图案的亭子，两边是石头龙门、石头洛龟。往里就是道统庙正殿，供奉着三皇五帝三王、周召孔孟诸位圣贤，周程张朱李许吴等理学大儒石像，藏有五经石卷。东堂为祠堂，堂后有三间石洞，中间洞额题云岩。壁刻有忠臣孝子画像，先儒格言及咏道诗。院中有一个香炉石龕，被称为道统香火殿。

这样一个以石块垒砌的祠堂，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名胜之地，人们纷纷前来观瞻、游览，并被尊称为晏公祠。因此，晏公祠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帝京景物略》中说：“晏公一祠，学圣尊儒，大书特书之。”蒋一葵《长安客话》中描写：“晏公祠内皆石室，琢三皇五帝列圣贤像。”《春明梦余录》中黄汝亨记曰：“自吾人西山，所见金碧殿阁，皆浮屠氏之官，大都皆中人自营其身而香火藏，而此室独及吾儒门一宗，何类无贤？”《日下旧闻考》姜应甲诗云：“空山石祠堂，落穆跨深壑。像古占圣贤，高下坐渊渊。殿碑列龟龙，如出自河洛。煌煌先儒语，所为忠孝作。性理二百卷，题壁见大略。历览感我心，人传晏公庙。厥志在尼山，高邈得所托。愧哉彼檀施，衅血涂丹雘。”这种说法清新脱俗、沉博绝丽。

以道统执念终其一生

晏公祠能够被人们记住，可见晏宏并没有被人们遗忘。晏宏是一名普通宦官，在明史中也不见经传。他凭着执念，虽然一生跌宕起伏，却始终尽心尽力的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可谓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生而默默无闻，死而不留遗憾，卒于位，赐谥祭。

晏宏生于天顺七年(1463)，卒于嘉靖十三年(1535)，少年时期受过内书堂教育，弘治元年(1488)晋升为太监，督管京师仓储，人称晏御史。之后为弘治皇帝守陵三年，在家养病十三年。嘉靖元年(1522)出任陕西镇守太监。

镇守陕西期间晏宏恪尽职守，重视教育，兴修水利，建设三边。据《陕西通志》记载，嘉靖七年(1528)，晏宏在西安贡院西隅，旧三皇庙遗址上建了道统庙。据《民国咸阳县志》记载，嘉靖九年(1530)，咸阳渭河土堤崩塌浸溢，镇守太监晏宏与当地官员及时决断，以沙石加固河岸，修成石堤。期间前往边地，与边民同甘共苦，礼部尚书黄绾曾用四首诗作为总结，从中摘抄几句：“历历青山落日低，耕夫应共战魂悲……”“客居山上临沙漠，百里黄河负水还。”(《题晏太监行边图》四首，见《黄绾集》卷七)

嘉靖朝吏部侍郎林文俊的评议写道：“清名俭德重当时，道路

三星堆青铜面具、金面罩辨析

张明华

上供人们祭祀、膜拜、祈禳，遇到节日祀事，亦可置轿参与巡街、巡安、游神之类的活动，具有纳吉驱邪的功效。其源头可能与距今5000年左右的石垺先民有关，他们将戴面具的大巫师像凿刻于大型社坛或神庙的石构建筑上，瞻仰膜拜。

大面 亦即脸谱，源头可至新石器时代驱邪避鬼的脸面涂绘和雕题纹面，在独龙族、爱斯基摩人等国内外原始部族中，至今能见于遗。一般脸谱可分为戏剧脸谱和社火脸谱两大类。戏剧脸谱是传统戏曲角色行当，京剧和某些地方戏中“净”的别称，俗称“大花脸”，社火脸谱用于古老的宗教礼仪中。

综上所述，三星堆出土的器大重笨的柱形、梭形眼大型青铜面具，应该与“面像”接近。它们平时是置放于寺庙、社坛供人祭祀、膜拜、祈禳的英雄、祖先、大巫、神灵的偶像，在某些节日礼仪中又会坐轿外出巡安、巡游、游神，或将它们戴在用泥木制作的大型巫、神脸上，具有纳吉驱邪的功能。

另从三星堆出土的大多数青铜人物有戴柱形眼、梭形眼面具的事实得以证明，当时参与巫事的先民(除了个别如长鬃青铜侧跪人像K4:65)普遍有戴这类与人脸大小相仿的具有假面功能的面具。可是，三星堆至今未见一件与人脸规格接近的这种单独成器的青铜面具实物。即使他处出土时代相仿的青铜面具，有的是窖藏(陕西城固县赤村一窖藏出土21件青铜面具)，有的是墓底夯土层发现，而且结构不当(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墓墓道下7.5米处出土，面具背面的眼、鼻等部位焊接斜凸向上的圆管)而无法证明青铜面具可戴脸上使用依据。

三星堆面具中有少数几件平板式面具，其规格与功能应该与覆面或假面接近，但它们繁华的羽冠、勾云耳、弧角方脸大眼、阔嘴，有的脸上另附两颗巨眼(笔者考证这是源自良渚文化极简的巫师御虎蹲纹)，它们究竟是未识的逝者覆面?还是巫事仪式时佩戴的假面?还无法定夺。由于青铜面具质量较重，传承至今的面具中也不见踪影，还没有青铜面具戴在脸上的依据，因此，这种形式的面具，系逝者作覆面的可能性较大。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让人惊叹不已，很薄、很轻、很软，从外形上看凹凸有致，眼嘴穿孔，应该是戴在脸上的假面。一些学者的学术文论、图录的表述中将其称作金面罩、金面具，也有这种倾向。其实，这是有存疑的，用厚仅0.02至0.04厘米之间的金皮做面罩，太过轻薄柔软，极易扭曲、厚实一点，价值会更高。事实上，古今中外日常使用的金面罩罕有先例，目前多见的是金覆面。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金沙考古现场，除了在坑中单独发现过几件，其他都贴饰于青铜人所戴的青铜面具上。结合金面罩外沿都有向内包裹折边的工艺特征，说明它是直接从青铜面具上脱落下来的，不应该单独成器，因此，该器名宜改为“面具金饰”为宜。

商代的黄金极为珍稀，那些脸贴贴有金饰的青铜面具人物，应该是三星堆社会中权级更高的角色。2021年，三星堆三号坑新出土的面具金饰残件，复原后宽31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最大的面具，应是三星堆级别较高人物青铜面具上的贴饰。而此人非1986年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莫属，可他面具上没有金饰。仔细观察三号坑这件面具金饰的五官格局、凹凸形式与大立人脸部非常接近，两者若能贴饰吻合，可让青铜大立人更加精准地彰显其三星堆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大立人与面具金饰分别出自一号和三号坑，发现时间也相差了30多年，这在过去是个大问题，但自三星堆神奇的墨座倒立鸟足顶尊神人器的散碎部件，居然页分别出现在三个坑中，说明三星堆各坑的文物时代相当，金面罩与大立人交叉复原有据可依。

当然，在笔者目前无法获得大立人头部的精确数据之前，这只是一种推测。与大立人同坑也出土过一件面罩式金饰片(残宽21.5厘米、高11.3厘米、重10.62克)，是不是大立人面具上的贴饰，还有待考古工作者的测试复原。

匠心独具晏公祠

王 一 川



地藏殿(北京市海淀区文物保护中心供图)

人传即口碑。全陕山川遗爱在，留官管钥旧臣宜。”

在拆与建中不断延续

512年过去了，西山昔日的王公墓葬都湮灭在杂草中，梵宫殿阁也消失在山野间，晏公祠却在不断地拆与建之中延续。遗址前立了一块晏公祠石碑，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康熙四年(1665)，晏公祠被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佛寺僧庵，改名为地藏庵。据《居业堂文集》记载，该书的作者王源听闻后，便约了友人黄宗夏一起去查看，发现原先道统门的位置换成了“地藏庵”三个字，道统正殿门额上刻着“地藏殿”三个字，“亭无存，仅存龟马，石室塑所谓地藏菩萨者于中，十阎罗土。”原来的圣贤石像放在屋后用树枝支撑，所拆石龕堆在土坡上。“东亦无庵，有洞三，曰停云岩，中供一小佛像。”他们发现佛像合石竟是刻有先儒格言的石块所垒，最上边一块是鲁斋草庐石龕。香炉石龕还在，所幸重修房屋的墙壁大多使用原建筑条石，部分石刻文字得以保存。

新建的地藏庵，仍然有人前来游览。人们在游记中却说的是晏公祠，耐人寻味，其中就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诸宫贝阙影参差，不种娑罗即产芝。不信中官尊道统，此山犹有晏公祠。”(查朝珠晏公祠诗，《家垣识略》卷十五，郊垌四)或许晏公祠已经成为地名文化符号，有着其特有的含义。

石刻文字就是活的文物，保存着历史印记。地藏殿(停云岩)的石刻是仅有的晏公祠建筑遗迹，“地藏殿”石匾上分别刻着“大明正德壬申孟秋上日建”“大清康熙四年二月重修”的两行小字，这些字迹就是一个历史故事。虽然晏公祠最近一次重修之前仅剩断垣残壁，但是依然保留着少量的明代石刻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晏公祠院中的那座香炉石龕，还一直被保留至今，这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被移置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存放。石龕的南北柱上刻着两副对联，一副是“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另一副是“振振君子用之行而舍则藏，蹇蹇王臣进尽忠而退补过”。这些带着时间烙印、散发着古老的气息的石刻，蕴含着先贤的思想、弥漫着儒家文化的魅力，正是晏公祠内在含义的外化。